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厚文化根基

吴晓迪

翻开《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从《管子》中的治国之问，到田间地头的生活谚语，中国典籍、诗词、典故屡被引用。细节背后反映的是理论的文化底蕴。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文化根基问题绕不开。从文化根基入手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需要回答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经济学的文化根基何以存在，传统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经济理论，文化根基如何支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从哪里建起。

经济学何以有文化根基

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科学。在西方语言中，“经济”的本义是家计管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经济”指经世济民。一个管“家计”，一个济“天下”，词源之别，正是文化预设之别。《尚书·洪范》首列食货，《史记》设立《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设立《食货志》，历代赅续。一部文献史，就是中华文明对经济问题的系统思考史。经济学从来不只是技术的集合，其对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正当财富以及国家与人民是什么关系的回答，都蕴藏在文化的土壤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表明，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既受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党的百余年历史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济理论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的经济学，不仅要回答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要讲出中国文化的道理。这就要破除把经济学看作中性技术的误读。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个人本位取向，同样来自自定的文化土壤。问题不在有没有预设，而在预设是不是自己的。把经济学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文化立场的中性技术，正是“跟着讲”的认识根源；立起自己的文化预设，才是“自己讲”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经济理论的自信，同样建立在这份自信之上。

传统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理论

认识论的转身完成了，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中积累的经济思想资源怎样融入现代经济理论？这里要先划清一条界限：贯通不是比附。比附有时是拿一句古语去装饰一个现代概念，两张皮终究贴不成一张；贯通是把传统智慧融入理论的血脉，使其在科学范式中获得新生。是贯通还是比附，判断的标准不在引用了多少古语，而在是否把传统智慧融汇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逻辑，使之获得当代的理论生命。循着这条机理，可以看到几条清晰的线索。

贯通发展的价值归宿。《尚书》讲“民惟邦本”，《管子》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有若答鲁哀公问时反问“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深度契合，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吟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照进现实；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把富民理想化为制度安排。从“必先富民”到共同富裕，一线贯通的是发展的目的这个根本问题。

贯通经济活动的伦理规范。从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到王安石“以义理财”，再到叶适“以利和义”，义利兼顾、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在千年论辩中日新成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义利之辨提供了科学框架，习近平经济思想把这一智慧升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规范，既发挥市场激励财富创造的活力，又规范求利的方式。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涵养，到“以义取利，不利他是图”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市场经济在中国有了正确的义利观。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对此，中国古人早有深思。《管子》的轻重论，讲“散则轻，聚则重”，主张“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内含宏观调控的雏形；司马迁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下“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内含让经济活动顺其自然的治理之道。有为干预与因势利导，两种治理智慧对话了两千多年。习近平经济思想没有在任何一端止步，而是把二者综合起来提升至新的水平，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几条线索，指向同一个结论：根基，是传统智慧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现代理论的内在构造。

文化根基何以支撑创新

文化根基的支撑力，最终要落到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生成上。新发展理念、

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

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这些概念都不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货架上取来的，而是从中国实践与文化深处生长出来的。

以新质生产力为例，可以看得分外真切。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概念作了系统界定：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被置于数智时代中，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重要标志。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新时代的。其锋芒所向，是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发展瓶颈。

“新质”二字，不是从域外术语中译来的，而是从中华文明的土壤中长出来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的品格使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主动拥抱技术革命。“新”与“质”并立，求新但不慕虚，使创新落在质优上、落在实体上，充分体现了文化根基是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生成条件。

回望来路，从向苏联教科书取经，到引进西方经济学方法，再到新时代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轨迹分外清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文化根基的挺立，使中国经济学从“跟着讲”转向“自己讲”。经济理论的自主建构，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性在经济理论领域的确立。这是认识论层面的深刻解放。习近平经济思想所凝练的概念，既深植五千多年文明沃土，又直面当代中国的重

大课题，因而既立得住、又传得开。

自主体系从哪里建起

根基已经探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随之清晰。首要的是提炼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带出概念群，概念群生成分析范式，分析范式支撑学科体系，这是自主建构的基本路径。

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生成仍在继续。“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其中“投资于人”四个字，从文化根基处读，别有深意。中国传统文化讲“民惟邦本”，人是邦国的根本而非发展的工具。循此文脉，“投资于人”之“人”，不仅是生产函数中的要素，而且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所在。其理论内涵仍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阐释亦需从文化层面考量。

经济学的分量，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回答所处时代的问题。“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各门学科实现“自己讲”的共同方法论。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必将形成反映中国实践、体现中国智慧、面向世界开放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政治评论部副编审）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首次专门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出台系统性产业政策。做好历史经典产业这篇大文章，不能简单延续老思路，要跳出“只看产量规模”的旧观念，实现守正与创新并举、文脉传承与产业发展共促。

算好“传承账”。传承是历史经典产业发展的起点，没有技艺与文脉的接续，产业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经典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源共生，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数量位居世界第一，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做好传承，不等于固守老工艺一成不变，而是坚持保护与发展结合。一方面，夯实人才根基，建强老中青接续的传承梯队，持续推进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扶持“传二代”“非遗新青年”成长，既守护老一辈匠人的宝贵技艺，又鼓励年轻一代赓续接力。另一方面，推进技艺数字化发展，把藏在匠人头脑中的经验诀窍，通过数字技术采集、标注、结构化，建设“产业大脑”、工艺知识图谱，把茶叶发酵、瓷器釉料配比、中药炮制等手工艺转化为可复用的数据资产。同时，发挥标准的固化作用，把一代代匠人的实践经验提炼上升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把传统工艺精髓转化为可落地的生产规范，让手工作坊、小微企业有章可循，实现经验型生产向标准化生产平稳过渡。

算好“创新账”。历史经典产业焕发新生，关键在于推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双向奔赴，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通过科技创新破解传统产业的效率与品质瓶颈。依托工艺迭代、创意升级与品质管控，深挖文化附加值，推动产品从初级加工品向高附加值精品跃迁。抢抓“人工智能+”行动的发展机遇，为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如丝绸行业借助AI技术，快速生成千百种纹样方案；瓷器烧制依靠算法调校窑温，保障优品率。立足传统工艺固有的绿色循环理念，在生产、流通全产业链践行低碳发展，推广简约可循环包装，发展绿色采购、绿色供应链，让传统美学与绿色消费同频共振。推动龙头企业建设“未来工厂”，带动小作坊共享技术成果，让科技红利覆盖各类经营主体。

算好“品牌账”。好工艺卖不出好价钱，根子在于文化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品牌竞争优势。历史经典产业不缺少好产品，缺少叫得响、认可度高的消费名品，缺少走向全球的一流企业。要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深耕细分赛道，推动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联动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申报中华老字号，健全老字号动态管理机制。扎实推进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建设，到2028年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培育50家百亿级龙头企业，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同时，创新讲好品牌故事，利用博览会、消费名品全国行等平台，通过微纪录片、AI短剧等多元传播载体，推动传统元素对接现代审美，实现从“卖原料、卖代工”向“卖品牌、卖文化、卖体验”跃迁。

算好“融合账”。打破产业边界，拓展消费新空间。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正在向高层次迈进，历史经典产业兼具物质消费与文化体验属性，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激活产业消费潜力，绝非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推动“历史经典+”多元融合，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深化“历史经典+文旅”，把制茶、刺绣、制瓷搬到台前，打造创意市集、沉浸式体验门店、夜游消费场景，培育“跟着非遗去旅行”等特色IP，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传统工艺。拓展“历史经典+康养”，深挖中药、茶叶、蚕丝健康价值，联动医疗机构、康养基地开发养生茶饮、中药浴包、蚕丝康养用品。做实“历史经典+教育”，广泛开展研学实践，推动工坊、大师工作室面向青少年开放，厚植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做强“历史经典+乡村振兴”，立足产业扎根山野田间的特征，推广“村集体+家庭作坊+名企”模式，完善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与股份合作等，让茶农、药农、蚕农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算好“开放账”。中华文明的影响力，需要高品质产品作为载体。要推动中华优秀工艺、经典产品进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一方面，做强标准软联通，持续推进丝绸、茶叶、中医药等领域国际标准研制，把中国成熟工艺、质量规范转化为国际通行规则，以标准带动产品出海。以灵芝为例，国际标准发布之后，我国灵芝出口均价提升107%，出口额同比增长285%。另一方面，搭建多元化出海平台，培育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海外工坊，推动中国历史经典产品进入海外高端商超、免税渠道。同时，优化国内离境消费市场，推动经典名品进驻口岸免税店、市内免税店，服务入境游客消费，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赋能。

守正才能固本，创新方能致远。我们不能用现代工业逻辑简单改造传统技艺，也不能固守传统技艺排斥科技赋能。要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千年老手艺传承好、火出圈，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本版编辑 裴文美 编高妍
来稿邮箱 jjrbl@sina.com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李 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不断提升经济循环的质量和层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向“十五五”，必须夯实国内经济的内部根基，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

关乎循环“强不强”“稳不稳”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前者关乎循环“强不强”，后者关乎循环“稳不稳”，二者辩证统一，共同体现国内大循环的质量与成色。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来自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是国民经济循环不依赖外部牵引，由其内部各环节相互生成、自我强化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是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形成的。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消费则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可见，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本质上是各环节顺畅衔接、相互促进所形成的系统合力。具体来看，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需求拉动。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是深厚的动力源泉。二是供给驱动。超大规模市场为

分工深化和技术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分工深化又提高生产率、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动能。三是流通连接。流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枢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能够将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循环动能。四是制度改革。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持续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提升循环效能。以上四方面因素相互贯通，共同构成国内大循环的动力系统。

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是指在外部的风险冲击下，循环体系自主可控、稳定运行及动态恢复的能力，受比例性、自主性和韧性三者影响。比例性是可靠性的实现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使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比例性表现为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协调适配。自主性是可靠性的关键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粮食、能源资源、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安全底线守不住，循环的根基就会动摇。韧性是可靠性的动态体现。韧性并不意味着静态的平衡，而是动态的抗冲击与自我修复能力的体现。立足我国实际，韧性来自超大规模市场的纵深空间、完备的产业体系，也来自有效的宏观治理。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相互依存、相互成就。一方面，内生动力是可靠性的基础。没有持续的内生动力，经济循环的可靠性就会失去支撑。另一方面，可靠性是内生动力的保障。没有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再强劲的内生动力也可能被消解。比

例协调才能使循环不失速，自主可控才能使循环不中断，韧性充足才能使循环不瘫痪。从根本上看，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统一于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这既在“质”上决定内生动力的强弱，又在“态”上决定可靠性的高低。

聚焦重点采取更多硬招实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和水平，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强大内需潜力，但居民消费率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尚未完全破除、全社会物流成本仍然偏高。“十五五”时期，必须着力破解这些难题，聚焦重点采取更多硬招实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一是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加快形成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以高质量供给打开新消费空间。同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分配端夯实畅通经济循环的有利条件。

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根本上增强国内大循环自主性。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积极推进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联动，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升国内大循环可控性和可靠性。

三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等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等制度，优化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四是把安全发展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健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

五是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引入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能。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为经济循环拓展战略纵深。塑造国际贸易和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资源。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开放大学党委书记）